

# 杜威五大讲演

## Dewey's Lectures in China

[美] 杜威/著 张恒/编



*John Dewey*

哲学应当是“人”的哲学

*When focusing on "human", philosophy's restoration will com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杜威五大讲演

## Dewey's Lectures in China

[美] 杜威/著 张恒/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威五大讲演 / (美) 杜威著, 张恒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11

书名原文: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ISBN 978-7-80251-715-8

I. ①杜… II. ①杜…②张… III. ①哲学理论—美国—现代 IV. ①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3283号

Copyright©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杜威五大讲演

---

作者 [美] 杜威

编者 张恒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本 635毫米×965毫米

印张 20

字数 270千字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80251-715-8

定价 38.0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杜威在华

如果要谈曾经对人类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们，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一定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杜威先生作为实用主义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不仅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相当的位置，对中国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杜威于1859年10月20日出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伯灵顿。他的父亲是镇上的小杂货商，人缘不错，也能赚些小钱，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并不上心。杜威的母亲出身于佛蒙特州的望族，受家庭影响，她对孩子的将来抱有厚望，期望他们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因此格外注重他们的教育。杜威家的两个儿子果然没有辜负母亲寄予的众望，一个成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成了饮誉世界的大思想家。

少年时代的杜威对中小学课本中枯燥无味的知识完全没有兴趣，倒是课堂之外的零工和劳动让他受到很多教益。不难想象，这些经历都构成了他将来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

杜威16岁进入佛蒙特大学，1879年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1882年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在霍普金斯大学，杜威学到了皮尔士的逻辑学，霍尔的实验心理学，最重要的是黑格尔的哲学，使杜威成为了新黑格尔主义的信徒。1884年，杜威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经由教授提携，得到了密执安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此后一直到1894年，他才从密执安大学辞职，受聘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并出任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整整10年，开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

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教育实验活动，并致力于美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杜威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著作主要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等，这些是他实用主义教学思想体系形成的肇端。1904年，由于同校长的矛盾，杜威辞去了芝加哥大学的职务，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这段时期，他放弃了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实验工作，转而把重点放在了教育原理的阐发中。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他的哲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很多教育界同仁赞叹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教育思想唯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堪与媲美，说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三个阶段。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后期，杜威先后到日本（1919）、中国（1919—1921）、土耳其（1924）、墨西哥（1926）、苏联（1928）等国进行了讲学访问。这一系列讲学活动使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在这些国家得到了深入的传播。1930年，杜威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此后仍然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著。1952年，杜威在纽约去世，享年93岁。

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除了美国之外，杜威的思想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他访问讲学的几个国家中，杜威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量也最多。但是，不得不说明的是，杜威的中国之行却是一次偶然，因为当初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远东之行的计划内。在来中国之前，杜威正在日本讲学，期间接到了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得意门生胡适教授的来信，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当时在日本的蒋梦麟、郭秉文等人和胡适联系之后，登门拜访了杜威夫妇，并以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1919年4月30日，杜威终于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讲学活动。

没有想到的是，仅在三天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目睹了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的场面，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震惊而又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当舆论像这样真正表达出来时，它却有着显著的影响。”杜威因此开始关注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学生们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并向哥伦比亚大学告假一年，后来又

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才离开中国。杜威的中国之行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

在华期间，杜威访问考察过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还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去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

杜威讲演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包括16次关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15次关于伦理学的讲演，3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的讲演，此外还有关于哲学思想派别、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发展、实验逻辑的系列讲演，等等。胡适等人曾多次担任讲演的翻译。这些讲演的内容，都迅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一时间，中国广大学者学子竞相传阅。仅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就已经印了10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在中国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物，都曾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杜威思想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相当深广，这与杜威中国之行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在影响着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对杜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写道：“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

可以说，杜威的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特别是他的教育学说，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很多思想，即使在当今中国，也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此外，本书个别言论，如35页中“但是我们只承认它为英国的一部分，而不承认它是个国家”为时代的局面所致，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者不作改动。

# 目 录

---

001	第一部分 杜威五大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002
	教育哲学	066
	思想之派别	134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177
	伦理讲演纪略	205
245	第二部分 在华其他讲演	
	初等教育(杜威夫人演说)	246
	大学与舆论——北大二十二周年纪念日讲演	259
	杜威在福州青年会讲演	262
	南游心影	270
275	第三部分 时人评论	
	实验主义与新教育	276
	杜威之伦理学	280
	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291
	杜威的教育哲学	296
	杜威论中国思想	305

##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毋忘/笔记

这个讲演，前面四篇是毋忘先生记的，第五篇起是我记的。此次修改原稿的时候，毋忘先生还在医院，所以这修改的责任应该全归我负了。——伏卢

—  
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尚志学会，以及新学会，使我今天得以  
来此讲演、实是我国际的荣誉。

我这十六次讲演的题目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正如人先会吃饭，然后有生理学、卫生学；先会说话，然后有修辞学、文法学、逻辑学。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人类先有制度、风俗、习惯，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人类有一种天性，遇到需要时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例如饿了要吃、倦了要睡，久而久之，便成习惯了。但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了又如何？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有许多志士往往对于制度、风俗、习惯、产生了疑问，以致牺牲了性命。历史上的证据很多，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便是个最明显的证据。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人家便加他个妖言惑众引诱青年的罪名，把他毒死。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

这样说来，思想和学说都是讨人厌的东西，大家便应从了制度、风俗、习惯走，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呢？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产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感觉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产生。所以社会哲学的产生，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产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从历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一定不会产生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染了病，所以才有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出现，社会政治亦然，必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也发生在纷乱征战的时候。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决不会有柏拉图(Plato, 约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等的学说出现。我的意见如果不错，那么中国各种学说的产生，亦当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也决不会有老子和孔子两大派的学说产生。

以上所讲的，不过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的原因，现在要讲产生以后的影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然因社会和政治有病，然后产生，那么究竟是种空言病状的诊书，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譬如汽机的汽，是呜呜然放出的，还是真能发动各种机械的呢？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也是现在所应当讨论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极端的学说。一是极端的理想派。这派认为学理对于实际有极大的影响，没有学理，便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缺点是忽略人类的习惯、自然的倾向和种种没有意识的行动。这是太理想的了。例如这次欧战，依这一派人说，以为都是两处学说冲突的结果。二是极端的唯物派。这派认为无论什么理想，都是物质的果，不是物质的因，学说不过是一种果。这一派的人无论批评什么，都应用唯物历史观的。他们注重生活状态、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利益，甚至某种美术也说是某种生活所产生的。

这回大战，依唯物历史观的一派看去，完全不是思想的冲突，而是物质上的冲突。德国在战前，物质发达已极，不得不向外发展，所以要争海上、商业、殖民地等霸权。就是英国方面，也有许多物质上的动机。这固是不错，但依这一派说来，简直完全是物质的，一切哲学宗教都是物质所生的结果，甚至于正义人道文化等好听的名词，据他们说来，都是资本家和军阀造出来哄人，做保护自己物质的器具，这也太过了。我提出这两派相反的学说来，并不是想批评他们，不过略为研究，好引起第三派的学说来。第三派的学说是最

公平的。大概思想学说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果，而非因，但产生以后，它又变做因了。思想学说很像漏斗一般，漏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便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思想学说一经传布到人，人有模仿、崇拜的心理。在这里，人是果，传到那人时又变因了。我们对于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政治上要它产生什么影响，所产生的影响怎样是好，怎样是坏，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思想产生以后，第一种功用是把流动的变为凝固的，暂时的变为永久的。如有一件变迁不定、一瞥即过的事实，把它抽象地提出来，变成一种学说，便凝固了，永久了。这个关系，实在太太，往往会引出危险。如罗马旧教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采纳为正宗哲学，便是一例。又如东方孔子的学说，一经许多儒家的阐述，经两千年相续到今，也可想见这种功用的厉害了。

第二种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维持许多人的信仰，去做很重大的事。例如这次欧战，只把自由、正义、公理战胜强权，几个名词可以使多数人去开战。这可证明唯物历史观一派的错误，若说这是资本家军阀所利用的，那么我要问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空名词，这些空名词又怎样能号召人去打仗呢？于此可见学说的势力，也可见人类的动作，不单是物质的动机。

以上所讲的两两种功用，不单是好的学理有，便是坏的学理也有，不过好坏的效果不同罢了。我们现在先讨论从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然后再讨论现在是否有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需要。

大抵这种派别，与人类性格的分类很相近，不外激进和保守两派，激进派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政治，往往想把它根本推翻，另造一个乌托邦。

这一派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简直不睬，另有超于现在的社会政治。从历史上看去，这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后。例如希腊，先有柏拉图，后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先不承认当代的制度，自己想出个“共和国”来做他的乌托邦，然后有亚里士多德的保守论。又如中国，先有老子的哲学，后有孔子的哲学。老子不满足于当代制度，要去破坏它，另造个乌托邦，他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想必诸位早已经知道了。

第一派的学说不承认现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注重个人——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本体；第二派也不是满足于现代制度，不过以为现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它本身也自有它的道理，后人没有照着它做，所以

坏了，我们只要去找出它原来的道理来改正或改良现制度便好了，所以趋于保守。

两派的区别，大概第一派主张抛弃现行制度，另创乌托邦，第二派主张探求现行制度本身的道理，第一派注重个人的反省，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自从有了这两大派的学说，社会和政治事实，都受了影响，有许多人才，都是因此产生的，所以我们不可不注意。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两大派。我形容这两派学说，不免说得过火一点。我的目的，是要说出社会政治的背景。因为人类有一种通病，不是过便是不及，前几千年的人类，都吃了这两种无端的亏。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就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

上述两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决”。一派极端的什么都不要，可惜天上不会掉下个乌托邦来，所以他们流于无为。一派极端以为什么都有理，只要还到本身的道理去，可惜办不到。这两派虽各走极端，所犯的病却一样。

怎样可以使人类的智慧，指挥监督他的动作，应付一时间、一环境的问题，便是现在要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 二

19世纪欧洲思想史有种共同的趋势，便是创造社会的科学，关于人生的科学——把从前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的方法，渐渐应用到人生方面来。可见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今天所要讲的，便是这科学精神，对于第三派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影响。

近代科学最初的起点，和人生的关系很少很远。所以第一步是天文学，进而为无生机的物理学和化学，再进而为有生机的植物学、动物学等。到现在知道人生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结果发生了许多人生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宗教、历史、语言等学科。这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日用社会方面去的例子。

这种科学的产生，无论成败如何，但有一句话可说，便是人类的思想变迁了。从前以为只有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人生方面何等繁复，何等不规则，决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但是近来却知道人生虽是繁复，虽是不规则，也可分析到简单，并找出它的规则来，便也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点可以证明人类的思想是变迁了。

社会科学家发明了许多社会科学，但又看不起社会哲学。他们以为哲学是玄谈，没有根据，不像科学有一定的律令，所以不值得去研究。

我并不想去批评他们，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可以说的：他们把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情形做了通则，以为百世而上、百世而下、东海、西海，都可应用，例如科学的经济学产生很近，时代是19世纪，地域是西欧，他们把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找出条理来，做了经济学的原则，以为上下古今，都可适用。这是社会科学所常有的错误。

就经济学产生的事实来看：当时的经济组织，是大资本制度，出产很多，销场很广；经济发展的方法是竞争的，不是互助的；经济组织的目的只在赚钱，不在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学上的各种通则，都是根据这种事实产生的，本是从一种特别情形特别事实底下的通则，如供求定律之类，他们却要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去应用，变成了公共的通则，又不许人家去修正。所以卡莱尔 (Carlyle, 1795—1881)、拉斯金 (Ruskin, 1819—1900) 一辈人，要根本推翻这种绝对的定律，以为只可应用于一时一地，绝没有这种普遍性的，后来又另创了一种历史的经济学。

刚才所讲的一节，是用历史的眼光去批评。凡是一个时代所发生的通则，时代变了，通则当然也变了，所以没有一种通则，可以称为定律。历史是继续不息的，通则也是继续不息的，所以无论哪一天决不能获得最后的通则。

我所以提到19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可以分两方面说。

(1) 消极的方面。社会在那里长进，历史也在那里进行，所以要哲学去帮助它解说，不能单用描写或记载的态度，多少总有些理想。这是第一层。

(2) 积极的方面。社会科学产生之后，使人类思想变迁，知道人生的活动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然后社会哲学从空中楼阁里降下来，

使它带些科学的精神。这些精神是：注重事实；不尚武断；不敢以为最后的；不是天经地义，不过拿来应用的假设。因此成了带社会科学色彩的社会哲学。

第二层意思是说社会科学介绍了科学的精神与社会哲学，而成为我现在所讲的第三派社会哲学。这种哲学有三个特点：

(1) 实验的、从前的学说，都不根据人生日用的事实。现在这派学说，是人生日用处处可应用的，无用的结果便可证明或反证这学说的好坏，我们便可把知识和学理用来指挥引导我们的行为。

(2) 特别的、从前的学说，不是笼统便是普遍。现在这派的学说，是不用全称，不是笼统，都是特别的，没有普通的。

(3) 它的目的，在养成知识观念，可以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情形，解决特种问题。

这种新的社会哲学，把知识学说看作指挥人生的一种工具。科学本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科学，一种是应用科学，现在可以应用科学比这种新的社会哲学。纯粹科学不把人生欲望与意志放在里面，而社会哲学则把纯粹科学的道理应用到人生欲望意志上去，不但不排斥欲望与意志，还用学理去帮助欲望与意志，使它不陷于痛苦，不往邪路上去。

纯粹科学完全是旁观态度，譬如天文学，月亮的圆缺，都不与我们相干，我们的欲望与意志，一点也不能加入。应用科学则不然，譬如医学，把医生自己也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研究社会哲学，要用应用科学的态度，以学理帮助指导人的行为去达到他的目的。这是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实验的态度。

社会哲学不是纯粹科学，而是应用科学。如经济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类经济的活动，向哪一方面走，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生活利益。政治学也是如此，政治要怎样组织，才能使最大最多的人获得幸福。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指导它们，哪是对，哪是不对，这便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

再以医学为例，有一种是画符念咒、说病卖药的游方医生所用的医学，有一种是根据科学的医学。科学的医学把知识用来指挥帮助它的技术，可以

使人生得到利益。社会科学亦然，从前没有学理来指挥引导人类的种种行动，便万事听皇帝、听长官，以为有好皇帝、好长官，便有好政治。这都是听天由命去碰机会的。推而至于各种人类的科学都是如此，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机会，要用科学的知识来指挥一切，引导一切。

简单说，社会哲学何以要把它当做科学来研究，第一点是现在人类进化到这样地步，交通便利，调查容易。现在要去调查各种社会政治的情形，都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倘再不利用现在的文明，用科学的知识来指挥人类社会政治的行为，可能发生很大的危险。偶然的一件事，便把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东西，都废坏了。

第二点关于方法，从前是笼统的、抽象的、理想的。现在是个体的、特别的、事实的。须要注重个体特别事实与通则通例的关系。如社会哲学要研究各地各种的时势，使之与通则通例发生关系。

譬如铁路工程，决不能造一条笼统的理想的抽象的铁路，一个个都是具体的特别问题，如河流、山道、道路的高低，以及工程的经济，都要算计算的。

欧洲思想史上有个例，17世纪是个纷乱时期，有宗教战争，有政治战争，有朝代战争，因此当时便有一种国家主权、法律和秩序的需要。所以当时的学说，没有不注重国家主权、法律和秩序的。这是一种时期、一种地方的一种特别情形。以后却变成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当如此。至今还崇拜那国家主权、秩序、法律，我们还看见这等学说在中欧的危险，结果发生这次的欧战。

到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上半期，恰好有一种相反的状态。自从蒸汽机发明以后，生计状态大变，从前干涉的学说不适用了。而且产生了一种极端相反的放任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可是这种主义到现在又不适用了，这种主义的流弊，被资本家利用，没有势力的人与有势力的人战斗，当然是没有势力的人失败。所以离开了时代和环境去讲哲学很是危险的。

旧式的社会哲学，只是两极端，一是对于社会下总攻击，一是对于社会上总辩护。

现在我们所讲的第三派哲学，不是总攻击，也不是总辩护，是要进步；

不是天演的进步，而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进步。

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社会。但是要再造或者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以上所讲各方面零零散散的改革，都很复杂，几乎无从下手。需要把它一件件地分析开来，然后一件件地去做。今天到此听讲的人，学生居多，学生啊，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地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我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 三

前两次讲演社会政治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社会政治纷乱不定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然后有医社会病政治病的学说。这学说有三种区别：

(1) 悬一个理想的目的，与现状根本不同，去根本改造现社会和现政治。

(2) 这一派不如第一派的激烈，想找出个根本大道来，去补救修正现制度不良的地方，结果是毗于保守的。

(3) 这一派与上两派都不同，是想随时随地去找出现制度具体的病来，谋具体的补救或修正。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第三派的学说，也把一、二两派的学说，提出来略为批评。某种学说发起于某种病的时候，这学说的目的，在于修正或补救这种病——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于修正补救现社会政治——我们对于现制度要去解决其具体的问题之外，还须有一点能指导全体的观念。譬如航海，有了罗盘，一定还要有地图。所以我们要知道社会动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的冲突，有了这样的地图，我们才能想出什么修正和补救的方法。从前旧派的学说，总好说两两相对的名词，如说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民与国家的冲突、法律与自由的冲突等，连冲突的具体原因都看不出来，还说什么修正补救的方法呢？我们现在所要找的，还是那具体的事实的原因，而不是几个抽象对立的名词。

现在我们要提出第一个观念来，凡是一种冲突，不是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制度，实在是人群 (Group) 与人群的冲突。什么是人群？人群是人类有公

共的目的去共同活动，小而至于一个游戏的组合——像球队，大而至于国家种族，虽大小不一，但人群与人群既有许多接触，便不能不有冲突。所以凡是冲突的产生，都是人群与人群的冲突。

有一种需要和兴趣，自然会有一种人群产生。譬如男女之欲，是一种天性的情欲，有了这种需要，然后有男女居室，成一家族。又如饮食和自卫保身之欲，也是一种天性的欲望，有了这种天性的欲望，然后有商工业、交通业。人类又有权力的天性，所以有纷争，有纷争然后有政府，有法律，所以有国家。人类又有信仰的天性，所以有宗教。

这都是人群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总而言之，人类有天性、情欲、兴趣、需要，每一种天性、情欲、兴趣和需要，便可产生一个人群。

以上不过讲人群产生的原因，现在要提出第二个观念来，便是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原因。譬如我在家庭为一分子，在宗教国家等，也都是一分子，本来分不甚清。可是这许多人群，不能同时平等地发展，这便是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去，往往人群的发展偏向着一方面，其他的方面不是赶不上，便是被压下了，久而久之，积了几百年，那赶不上或是被压下的一方面，便要对于发展的一方面发生冲突了。我请举以下的几个例。

## 宗教

欧洲中古时代，从公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足足的一千年。这一千年里，宗教组合占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如家庭的组合，政治的组合，多统属在宗教组合之下。它提倡独身，将家庭的组合压下了；它提倡精神（禁欲），便将因饮食保身等而产生的工商业交通业等经济的组合压下了；推而至于算术，它反对的是耳目之娱，结果只有宗教的算术——便是用算术做宗教的奴隶。再推而至于教育，也只有教会的教育，它怕科学发达，去破坏宗教的根本观念，所以把别种教育组合压下了。从这个时代以后，宗教与各方面——政治等——常常发生冲突，打了几百年仗，到现在如意、法等国，还常有宗教和政治等问题发生，可见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宗教的组合在历史上占了奉为一尊的地位，把别的人群——政治、家庭、美术、教育等——都压下去，做了它的附属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历史上，除了三个例外，没有一处不奉宗教为一尊的。那三个



例外是：希腊，中国，以及美国。实际美国还算不得例外，因为美国的历史很短，它的老祖宗，已经经历过奉宗教为一尊的时代，美国人不过是前人播种，后人收获罢了。除了这三个例外，没有不经过宗教独尊，把别的组合压下去，做它的附属品。这不是很重要的例子吗？

### 政治

学者所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有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斗争，而是家庭与宗教的斗争。譬如宗教主张独身，便成了独身的社会。但人有情欲的天性，要有男女居室，宗教的社会不容许他。看似个人与社会之争，实是家庭与宗教之争。所以不能把斗争的方面，当做斗争的原因。除此以外，政治的组合，在历史上也曾占有过特殊地位，也曾把别的组合，如宗教、家庭等压下去做它的附属品。现在有一段故事可以拿来证明这件事。有一个西洋人与印度人论东方所以不振的原因，西洋人说：“东方人不能维新，如印度土人，都最守旧，别的不说，印度人负重，向来用头去顶的，有一天运煤，煤虽载在车上，车还顶在头上。”印度人反驳他的话，很能证明政治组合的特殊地位。印度人说：“东方人因为习惯所囿，所以印度土人用头去顶车。然而西洋人用小车子载煤，小车子仿佛是政府，头顶是表明个人，小车子只算是表明政府。西洋人应受东方人的教训，便是政府的地位太重了。”西洋人把政府实在看得太重，别的不说，单说欧战以来，政府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什么铁路、矿产，以及经济、财产、教育，都可给它掌握。结果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明白人发生疑问，究竟国家政府是否应有这么大的权力，把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种种的组合。将来这种种怀疑，一定是有加无已。

### 经济

方才所举第一个宗教的例子，第二个政治的例子，都是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的组合，这等状态，是否合理，早已发生疑问。现在举第三个例子。常人都说美国物质文明发达，是毗于唯物观念、金钱主义的。这话虽不尽然，实际美国的经济组合，确占特殊地位，把政治组合都压倒了。大资本家压倒政府，有时竟不晓得政府在哪里，还疑惑它在大城镇里的大工厂里呢。这种经济独占的流弊，使文学、美术等，都落在欧洲之后，现在虽随时想去改正，但最终难保将来不发生冲突。